

国立大学与国民政府

——以抗战爆发前浙江大学校长更迭为主线的考察

张 静

内容提要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与其他国立大学类似,浙江大学在其发展中遭遇了一系列困境:教育经费短缺与拖欠,校长频繁更迭,教师索薪罢教,学生运动迭起。浙大历任校长皆试图解决各种问题。在其经费、校长人选、学潮等问题的产生及应对过程中,除校方的种种努力外,也可以看到国立大学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特殊的地缘因素,蒋介石及其亲信的浙籍官员对于浙大事务多有插手。浙大为解决自身发展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也设法与蒋介石等联系,以争取自身利益,甚至试图影响国民政府的某些高等教育政策。

关键词 浙江大学 程天放 郭任远 竺可桢 蒋介石

1930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与同时期多数国立大学类似,浙江大学在其发展中遭遇了一系列困难艰窘:教育经费累年短缺与拖欠,校舍失修,校长频繁更迭,教师索薪罢教,学生运动迭起。此外,外患日迫,国民政府强化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与干预,也加重了这种困境。

浙江大学的前身为1897年建立的求是书院,几经易名,1903年更名为浙江高等学堂,1912年停办。192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其旧址建立第三中山大学,将原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分别改组为该校的工学院和劳农学院,蒋梦麟任校长。^①因试行大学区制,该校还掌领全省教育行政。1928年4月,该校更名为中华民国大学院浙江大学,7月,改为国立浙江大学。1928年10月,蒋梦麟被任命为大学院院长。^②1929年8月,大学区制取消。^③1930年7月,他辞去遥摄的浙大校长职。此后,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先后有四人担任浙大校长,分别为邵裴子(1930年7月至1932年3月)、程天放(1932年3月至1933年3月)、郭任远(1933年3月至1936年4月)、竺可桢(1936年4月任命)。对于此种教育事业主办者频繁更迭的现象,1937年即将卸任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曾慨言,教育工作必须长时期方能收效,中国教育事业主办者的频繁更迭,

① 劳农学院1929年1月更名农学院。

② 1928年11月,大学院裁撤,恢复教育部,蒋梦麟任部长。

③ 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开明书店1934年版,丙编,第56页。

实是教育效能不易提高的原因之一。^①从另一个角度看,校长的频繁更迭仅是表象,体现了此时期国立大学发展中的困境,它往往又与经费、学潮、民族危机、政府的教育方针等问题错综交织、甚至互为因果。

对于浙大历史的研究,以往多关注竺可桢治校时期。^②竺可桢无疑是浙大校史上一个重要人物,率学校走过抗战及国共内战时期,并使之获得显著发展,加以其前任郭任远因“一二·九”运动黯然辞职,他掌校之前浙大的历史或多或少显得模糊。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浙大所遇到的种种困境,也是同时期各国立大学所共通的,因此,考察该校应对这些困境的过程,有助于加深了解此时期国立大学的整体历史,进而考察国立大学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③就浙大这一个案而言,在其经费、校长人选、学潮等问题及应对中,除校方的种种努力外,又可看到国立大学与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之间的互动关系。浙大解决上述危机的尝试,亦有其自身的特殊之处,这种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地缘因素。浙江是蒋介石的故乡,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他不时到杭州小住,加以其不少亲信幕僚都是浙江籍,故而,他对这所浙江省最高学府,也给予一定关注,并多次到浙大视察。

本文试图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蒋介石《事略稿本》、相关人物的日记、回忆录、报刊资料等材料,以校长更迭为线索,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诸多因素,梳理1930年至1937年间国立浙大校务发展的大致情况,更重要的是,考察历任校长对浙大发展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的应对,揭示蒋介石及其亲信的浙籍官员在此过程中的考量与作为,以此为基础探讨国立大学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校长人选问题

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1929年公布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省市立大学校长由省市政府分别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除国民政府特准外均不得兼任其他官职。”^④1934年,又修订此条为:“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均不得兼任他职。”^⑤1937年前,依惯例,国立大学校长由教育部部长提出于行政院会议议决。大学校长人选之重要性自不待言。教育

① 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37年5月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17页。

② 关于浙江大学校史的研究有,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编《浙江大学校史稿》(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1982年印),毛正棠著《浙江大学》(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毛正棠、徐有智编著《浙江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贵州省遵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大学在遵义》(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浙江大学简史》第1、2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曙白等著《西迁浙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1980年以来,关于竺可桢的研究有很多,如《竺可桢》编辑组编《竺可桢》(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杨达寿著《竺可桢》(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毛正棠著、竺可桢教育基金会编《竺可桢校长主持浙大校政十三年》(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何方显著《党化教育下的学人政治认同危机:去留之间的竺可桢(1936—1949)》(《史林》2010年第6期),罗惜静著《政治与学术之间:浙江大学“学潮”中的竺可桢》(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2年),田正平著《“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从〈竺可桢日记〉看一位大学校长的精神境界》(《高等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等。

③ 关于此时期的高等教育,主要研究有陈能治的《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田正平、商丽浩主编的《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王东杰的《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蒋宝麟的《财政格局与大学“再国立化”——以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为例》(《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等。

④ 《大学组织法》,《国民政府公报》第227号,1929年7月27日。

⑤ 《修正〈大学组织法〉第九条条文》,《国民政府公报》第1424号,1934年4月30日。

家程其保认为，“大学校长，掌最高之学府，握全校之中枢，是非道德文章，足以领袖群伦者，难以胜任”。^①国民政府在决定国立大学校长人选时，除考量其学识、经验、资望、籍贯等之外，该人选是否是国民党“忠实同志”，以及其在高层的人际网络往往是更重要的因素。例如，1932年8月，蒋介石致电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并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云，“上海学界，本党素无基础，非设法布置，积极进行，后恐不及也”。他指示，务必从一两所大学入手，“派忠实同志，有能力者为校长”。^②

20世纪30年代初，校长人选成为高等教育中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各国立大学因校长人选争议而引发风潮的现象屡见不鲜。如，1931年的清华大学、中山大学，1932年的北平师范大学、中央大学相继因校长问题引发学潮。因此，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等均呼吁，应慎重选择校长。^③由行政官员出任校长，政治势力对于教育的侵蚀是最受诟病的一点。有人指出，“大学校长和中央要职，有密切关系，已为普遍现象”，从而批评“教育的官僚化”。^④胡适提出，“校长不得人”是造成学潮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政府的责任”。他批评各政治势力、政治派系对于大学行政的渗透与争夺。“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至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⑤青年党机关刊物《民声周报》的一篇文章则指出，国民党的“党治”是问题的根源。“办党固然是办党，办学也还是办党，学校早已成了党派的决斗场”，“假如‘党治’不取消，‘党化教育’不取消，而大学校长又非任用党员或官吏不可”，则即使采取解散大学的手段，对于所谓整饬学风，也“绝对不会有效果，这是可以断言的”。^⑥

此时期的浙大虽未因校长人选引发严重的学潮，但也有一次险生事端。在决定该校校长人选问题上，蒋介石、陈立夫、陈布雷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浙大第二任校长邵裴子早年留学美国，学习经济，回国后，曾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等职，并参与第三中山大学的筹备。1928年秋，浙大文理学院成立，邵裴子任院长。蒋梦麟任大学院院长后，邵裴子被聘为副校长，其后一直主持校务。1930年7月，教育部部长蒋梦麟辞浙大校长兼职，并推荐邵裴子继任，也是顺理成章的安排。1931年11月，浙大遭遇严重经费问题，由此引发部分学生冲撞教师的事件，邵裴子辞校长职。次月，又因工学院学生与省党部发生冲突，复请辞文理学院院长职。也有人回忆说，邵裴子之辞职，与其“学者办学，舆论公开”的办学精神和国民党当局的冲突，以及他抗拒蒋介石要其加入国民党的示意有关。^⑦

1932年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第12次会议经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提议，准邵裴子辞浙大校长职，并任命程天放继任。程天放系教育行政官员出身，早年曾留学美国、加拿大，学习国际法，1927年回国，担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此后历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安徽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他与陈果夫、陈立夫（以下简称“二陈”）关系密切。1932年4月，程天放就任浙大校长，

① 程其保：《论大学校长》，《时代公论》第7号，1932年5月13日。

②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6），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160页。值得一提的是，抗战前，虽然国民党注重任用“忠实同志”为校长，以达到控制大学的目的，但此时，国民党基本没有在学校建立基层组织，大学师生加入国民党者亦不多。参见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③ 臧晖（胡适）：《论学潮》，《独立评论》第9号，1932年7月17日；《上海各大学教授对中大学潮宣言》，《申报》，1932年7月11日，第4张第14版。

④ 吴景贤：《一九三二年之中国学潮》，《学风》第1、2期合刊，1933年3月15日。

⑤ 臧晖（胡适）：《论学潮》，《独立评论》第9号，1932年7月17日。

⑥ 仲平：《党治与学潮》，《民声周报》第31期，1932年7月10日。

⑦ 郑厚同：《我所知道的邵裴子先生》，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216页。

此后,改进校务,致力解决经费问题而确有进展。1933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第86次会议决议,任命程天放为湖北省教育厅厅长。这一任命出乎程氏本人及浙大师生的意料之外。随着第四次“剿共”湖北战事的结束,蒋介石决意大力整顿湖北省委,重新布置人事。程天放之调任湖北,正是蒋介石的安排。^①

与此同时,蒋介石亦在考虑浙大继任校长人选。2月3日,他致电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陈布雷,通知程天放赴南昌会面,并询问由何人任浙大校长为宜。^②陈布雷毕业于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学堂(以下简称“浙高”),两度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并曾任教育部常务次长。^③他向蒋介石建议:“以资望及与中央关系而言,力子、元冲两君均妥,然皆有任务。此外,陈大齐君,现任考试院事,孝公必不允许。又马裕藻,即幼渔先生,似亦可备选。且陈、马二人即使能来,亦决不能如天放之负责。倘鄂事能另觅人,最好对天放不予更动。”蒋介石回复说,浙大校长“可在省党委中遴选一员,或由兄调任”。^④不数日,有消息传出,浙大校长遗缺将由余井塘担任。^⑤余井塘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与“二陈”关系密切。据说,提名余井塘的正是陈立夫。^⑥

程天放本人并不愿赴鄂。在他看来,浙大事务已“稍有眉目”,学生潜心向学,“只需经费不困,前途大有可为”,而湖北教育经费积欠异常严重。^⑦他奉蒋介石电召前往南昌,向蒋面辞三次,未获允准。浙大各院学生听闻易长消息后,于13日晚分别召开全体大会,决议一面致电中央,恳请其收回成命;一面致电程天放,表明挽留决心。^⑧工学院学生自治会亦“于慨慨填膺中”开会讨论,决定联合其他学院学生,一致挽留程天放,并且决议:“电程校长请勿辞校长职”;“发表程校长之治校决心,过去成绩,及其改革方针”;“至相当时期,发表《除程天放氏外,拒绝任何人长校》之宣言”。^⑨浙大秘书长沈履亦认为:“教育机关的领袖若是与别的政治机关一样时常去更换他,这个情形对于教育的进展实在是不大相宜的。”故而希望政府当局能兼顾教育的需要,了解办教育者的苦衷,“俯纳舆情”不要强迫调动校长。^⑩为此,他还到南京接洽。浙大学生拒绝任何人继任之言论登载于报章,令教育部不满。时值热河战役爆发,沈履在南京感受到“中央同仁对于本校同学极为失望”。“他们认为在国难当前的时机,凡属国民皆当严守秩序,团结力量,一致御侮。但以国立大学的学

① 《程校长慰勉同学》,《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24期,1933年3月4日。

② 《蒋中正电陈布雷请张龄暂缓来见程天放速来南昌一叙》(1933年2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70100-00030-024。

③ 1929年8月,国民政府废除大学区制,恢复各省教育厅,陈布雷因蔡元培、吴稚晖的推荐,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其时,浙江教育界存在北大系与浙高系之间的门户之争,北大系势力占上风。对于陈之任命,时人预料浙高系将夺回地盘。然而,陈布雷赴任后,“用人取超然主义,以打破学派观念为整顿之前提”。由于教育界蔡元培、李石曾两系之争等原因,1930年12月,教育部部长蒋梦麟被迫辞职。在继任部长高鲁未到任前,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名义自兼教育部部长,陈布雷被任命为教育部常务次长。1932年1月,陈布雷再次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34年4月,辞职,5月,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参见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140页;张任天:《缅怀旧雨记当年——记陈布雷》,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134页。

④ 《蒋中正电陈布雷浙大校长可在省党委中遴选或由兄调任》(1933年2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70100-00030-063。

⑤ 《余井塘长浙大说》,《申报》,1933年2月12日,第4张第15版。

⑥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说明:本卷为竺可桢1936年至1938年间的日记。

⑦ 《程校长慰勉同学》,《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24期,1933年3月4日。

⑧ 《浙大学生挽留程天放》,《申报》,1933年2月17日,第4张第15版;《全体学生恳切挽留程校长》,《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22期,1933年2月18日。

⑨ 《学生会本学期常年大会纪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22期,1933年2月18日。

⑩ 《沈秘书长在纪念周中之校务报告》,《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24期,1933年3月4日。

生竟发出这种言论,不但有失国立大学生的身份,并且有失国民的身份”。^① 在民族危机之际,程天放决定服从大局,并促中央速委继任,以免贻误校务。^②

因浙大学生不接受余井塘,陈立夫复提名郭任远为浙大校长人选。^③ 陈布雷也赞同这一人选。^④ 郭任远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获心理学博士,是知名心理学家,倡导行为主义心理学,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创办复旦大学心理学院、生物学系,并任心理学院院长,亦曾任浙大心理学副教授。1933年3月7日,在行政院第90次会议上,经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提议,决议浙大校长程天放另有任用,拟请以郭任远继任。在郭氏的就职典礼上,陈布雷对学生讲话,强调中央对浙大的关心,“中央实以鄂事重要,未能允诸同学之请求,但是中央爱重浙大,一方面调程校长赴鄂,一面即以家长替子弟物色良师的精神,多方征聘,卒以此种诚挚的精神,感动了埋头研究室中的郭先生,出来担任贵校校长的职务”。“几年以来,我们常见国立大学校长更迭,动辄虚悬到三五个月或是半载以上,虽然有人代理负责,但学校的损失是无可补偿的。我们浙大在一个月中间,去一个好校长,来一个好校长,固然是中央所喜慰,也未始不是诸同学的幸福。”^⑤

郭任远就任浙大校长后,力图有所作为,改进校务,兴修校舍,但他行事专断,对学生严苛,推行军事管理,动辄开除学生,并使一些优秀教授相继去职。此外,自程天放长校,国民党党部势力开始进入浙大^⑥;到郭任远时期,“二陈”更明显地介入浙大校务。1933年6月,陈果夫致电蒋介石,提出浙大农学院素不健全,非彻底改组不可。又提及,郭任远亦有此意,但该院院长许璇在浙大时间久,骤然更换,恐生问题。“果意最好由钧座致郭一电,令其从速改善农学院,则较易进行。”并且,他已为蒋拟就电稿。^⑦ 许璇随即因“办事棘手”辞职,农学院教授亦提出总辞职。^⑧

郭任远执掌浙大三年,两度遭遇学生的反对风潮,以致两度请辞。1935年底,浙大学生起而响应“一二·九”运动。学生运动旋即发展为反对校长风潮,郭任远宣布辞职。在学潮愈演愈烈之际,浙大教育系主任郑晓沧向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的陈布雷表示,不能以浙大殉郭任远一人,并询问中央对郭任远是否必欲保障到底。^⑨ 陈布雷回答说,郭氏之任职浙大,“当时吾辈均为赞成者,不料其行径孤往,使优良教授联袂引去,就个人言,决无再与支持之理。唯继任实难其选,不得不静观其后,徐谋易人耳”。^⑩

经由郑晓沧的推荐,陈布雷向蒋介石提议以竺可桢为下任浙大校长人选。^⑪ 竺可桢毕业于哈佛大学,获气象学博士,回国后,曾任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等职,1928年,创办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并任所长。1936年2月11日,翁文灏告诉竺可桢,陈布雷等拟提名他为浙大校长。^⑫ 随后,蒋介石让人转告竺可桢,希望与他会面。起初,竺可桢由于气象所事务等缘故,不愿接受浙大职务。

① 《沈秘书长在纪念周中之校务报告》,《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24期,1933年3月4日。

② 《程校长慰勉同学》,《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24期,1933年3月4日。

③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29页。

④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民国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1935年12月25日,东南印务出版社,出版年不详,第91页。

⑤ 《郭校长补行宣誓》,《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31期,1933年4月29日。

⑥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29页。

⑦ 《陈果夫电蒋中正浙江大学农学院素不健全拟令郭任远校长从速改善对于许璇院长另行妥当位置》(1933年6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095-003。

⑧ 《浙大农院院长教授辞职》,《申报》,1933年6月14日,第4张第14版。

⑨ 郑晓沧,名宗海,字晓沧,与陈布雷是浙高同学。1929年,陈布雷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时,郑晓沧被任命为秘书兼第一科科长。

⑩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民国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1935年12月25日,第91页。

⑪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37页。12月28日,浙大成立校务会,以暂时维持校务,郑晓沧被推为主席。

⑫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23页。

2月21日,竺可桢在陈布雷的陪同下,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征询竺可桢对接掌浙大的意见,竺可桢答复,需先与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商议,蒋介石希望他即刻允任。^① 竺可桢考虑再三,最终在翁文灏、陈布雷、陈训慈(竺可桢友人,陈布雷四弟)等的劝说下,应允暂时担任浙大校长半年,以为过渡。他应允的动机之一是,考虑到此前党部试图控制浙大,“故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② 1936年4月7日,行政院第257次会议决议通过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所呈之浙大校长郭任远呈请辞职请予免职,另请任命竺可桢为校长案。

二、国立大学的经费困境

民国建立之初,教育经费支绌拖欠、挪用是窒碍教育发展的一大问题。为摆脱经费困扰,保障教育事业之进行,自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教育界人士提出教育经费独立的主张。财政专家贾士毅所著《民国续财政史》分析道:“教育费为岁出经费之一部,就财政原理而论,国家及地方预算成立,固应统收统支,不当另有独立之岁入,以供独立之岁出,致背财政统一之原则,惟近十年来,时事多故,军事当局往往移教育费以充军用。教育生命,不绝如缕,此教育经费独立之议所由来也。”^③ 1927年底,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与财政部部长孙科联名向国民政府提交《教育经费独立案》,获得通过,然而并未切实执行。

20世纪30年代初期,教育经费的不足与拖欠,已严重困扰各国立大学之发展,并在各地相继引发教师索薪罢教、学生学潮、校长辞职等现象。1932年,胡适在讨论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所提出的解决学潮的提案时,提出:“政府如有诚意收拾学潮,整顿学风,第一件任务应该做到不拖欠教育经费。”^④

从理论上讲,国立大学经费应由国库负担,但实际上各校经费来源各异。^⑤ 就浙大而言,1931年前,该校经费依惯例由浙江省财政厅就代征国税项下划拨。^⑥ 1928年度至1931年度,该校经费预算分别为:64.5万元、86.9万元、76.9万元、76.9万元。^⑦ 从浙江省的财政状况来看,1927年至1936年,该省大举从事建设事业,政费膨胀,又受水旱风灾、国民政府税制改革等因素影响,因而财政累年入不敷出,1930年后,省财政历经整理,到1936年,始转危为安。^⑧ 自1930年下半年,因浙江省财政厅拖欠,使完全仰仗于省库的浙大遭遇了严重的经费问题,引发了教职员索薪和学潮,并导致校长邵裴子向教育部请辞。此后,浙大历任校长皆力图解决此问题,与浙江省、教育部、财政部等接洽,并屡次向蒋介石寻求帮助。

1930年12月,浙大开学已四个月,但仅领到一个月的经费,校务难以进行。教职员因生活无

①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27页。

②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29页。

③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222、223页。

④ 藏晖(胡适):《论学潮》,《独立评论》第9号,1932年7月17日。

⑤ 陈能治将1927年至1937年间的国立大学按经费发放程序划分成六种类型,其中,浙江大学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为一类,“均由地方在国税项下直接拨付,名义上由中央负担,但是实际由地方支给,财部或作少量之补助”。陈能治:《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第214—222页。

⑥ 《浙大全体教职员再电呼吁经费》,《申报》,1931年3月28日,第2张第9版。

⑦ 《十七、十八两年度教育费岁出概算表》《十九、二十两年度教育费岁出概算表》,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第226—231页。程天放在浙大一次纪念周报告中提及,该校1931年度经费为78万元。参见程天放《浙大改组的意义及将来的希望》,《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02期,1932年9月10日。

⑧ 参见潘国旗《民国浙江财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149页;尹红群:《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权与地方财政(1927—1945)——以浙江为例》,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5年,第21—30页。

继,组织教职员联合会,甚至有大举索薪之动议。^①是月,国民政府宣布自1931年1月1日一律废除厘金。裁厘使浙江省失去一大财政收入来源,省财政厅随即以无代收国税款项为由,决定自1931年1月起,不再向浙大拨发经费。^②浙大再三电呈财政部、教育部请示办法,教财二部议定:浙大经费,全数由浙江省于营业税项下划拨,在营业税未开征以前,自3月起,每月由财政部拨发3万元,其余由浙江省筹拨。浙江省财政厅则提出,营业税为地方税,且尚未开征,将来开征之后,其税款亦远不能抵裁厘损失,实无余力负担,请示省政府,省政府复转咨财政部,浙大经费,仍由中央全数拨发。^③中央与浙江省之间相互推诿,而浙大接连数月财政困竭,致使校务几陷停顿。文理学院的史学与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因经费问题,开不出课,不得不呈请教育部准许学生到其他大学借读或转学。^④1931年3月底,浙大全体教职员因生计难以维持,电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请求迅予解决。^⑤4月14日,浙大学生会派代表向省政府请愿,要求解决经费积欠问题。^⑥

4月15日,蒋介石到浙大视察,参观工学院。次日,再赴浙大,在大礼堂向教职员及学生千余人演讲。他表示,对于经费问题,无需担心,从南京动身前,已决定解决办法,即:一半由浙江省支付,一半由中央补助,并云,“国家不怕没有经费,只怕没有好的学校”。^⑦

浙大经费虽经蒋介石承诺,由财政部、浙江省财政厅负担各半,但经费拖欠问题依然十分严重。1931年度,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积欠浙大经费达30余万元。^⑧11月4日,农学院学生为解决本院经费问题,全体进城面见校长。^⑨邵裴子召集农学院师生商谈,部分工学院学生进入会场旁听,不久,这些工学院学生冲撞农学院教授,包围冲击办公室,邵裴子及工学院院长李熙谋无法制止。邵裴子随后致电教育部,以“校务不易维持、学风尤待于整饬”为由请辞;李熙谋亦引咎辞职。^⑩教育部再三慰留,农学院学生也召集全体大会决议一致挽留,但邵裴子辞意已决,迭上辞呈,不再视事。

1932年4月,程天放就职浙大时,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依然是经费竭蹶。自“一·二八”事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全国财政滞塞,各地教育经费积欠。就浙大而言,程天放就任之际,经费中由中央拨给部分已积欠三个月,由浙江省负担部分亦数月欠发。正式就任前,程天放即与浙江省财政厅联络,无甚结果;他又进京向中央求助,教育部、财政部略有拨发。6月,浙大各学院教授因已欠薪数月,生活无法维持,数度推派代表向校方催发积欠而无果,遂召集全体紧急会议,宣布自8日起总请假。校方紧急筹发一个月薪俸,9日,各院教授恢复上课。^⑪

“总请假”风潮发生时,程天放正在南京接洽经费。返回杭州后,他对《申报》记者说明接洽情形。据云,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答复,从1932年7月起,浙大经费可按月发足;蒋介石亦关心该校,以私人名义致电浙江省政府,自7月起全额发放浙大经费。程天放称,对此结果,

① 《浙大教职员将索薪》,《申报》,1930年12月2日,第2张第8版。

② 《浙大全体教职员再电呼吁经费》,《申报》,1931年3月28日,第2张第9版。

③ 《浙大经费仍由浙江省营业税项下拨发》,《申报》,1931年4月5日,第3张第11版;《浙江省无力负担浙大费》,《申报》,1931年4月15日,第3张第9版。

④ 《教育部指令第三二三号》(1931年2月6日),《教育部公报》第3卷第7期,1931年2月22日。

⑤ 《浙大全体教职员再电呼吁经费》,《申报》,1931年3月28日,第2张第8版。

⑥ 《浙大学生向省府请愿》,《申报》,1931年4月17日,第2张第8版。

⑦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0),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433—444页。

⑧ 程天放:《浙大改组的意义及将来的希望》,《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02期,1932年9月10日。

⑨ 浙大有三个学院,工学院、文理学院位于杭州城内,农学院在城外。

⑩ 《邵校长向教育部辞职》,《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71期,1931年11月7日。

⑪ 《浙大全体教授请假风潮解决》,《申报》,1932年6月11日,第3张第10版。

该校教授、学生表示满意,问题完全解决。^① 6月7日,蒋介石致电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财政厅厅长周骏彦,嘱其“补助浙江大学每月三万五千元,务希按月照拨,并望于本周内拨付一月,二十一年度预算内,务望仍列四十二万元,弗予缩减为要”。^②

1932年7月,教育部在南京召集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校长会议,教育部所拟主要议题,包括各大学增设农工医理学院案;设在同一区域之国立大学,应避免院系重复案;各大学应培养国防人才案;各大学经费案。其中,国立大学经费问题是会议讨论的核心。程天放首先在会上提出经费问题,各校长敦促中央对国立大学经费应按月发清。关于国立各校经费问题,会议决议三项办法,呈于中政会和行政院:1. 国立各校经费,自7月起,不减成发给;2. 关于上年度积欠,应即确定清偿办法或以现金分期减偿,或发行有确实抵押之公债;3. 国立各院校经费,应指定的款,以为保障,其办法如下:(1)中央教育文化经济保管委员会保管;(2)指定下列各款:关税、俄庚款及其他、铁道部各路拨付财政部协款、卷烟特税,经指定之各款,应由该款征收机关按月直接拨付于前项之保管委员会。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函复各校长称,对于教育经费,政府现已积极筹措,并承诺自7月起,所有国立专科以上学校经费不减成发给。^③ 对于清还旧欠问题,汪精卫之复函虽原则上予以承诺,但未确定何时能发放;对于指定的款问题,行政院方面未肯赞同。^④ 随后的两个月,教育部的确按月向浙大发放经费。^⑤

中央方面的经费来源似已有一定保障,而由浙江省所负担部分能否按月十足拨发依然成问题。在程天放看来,浙大既然是国立大学,则其经费应全部由中央财政拨付,这是解决经费问题的切实办法。^⑥ 1932年11月,他呈请蒋介石,仿效中央大学前例,由财政部完全负担浙大经费。其呈文云:“惟浙江省财政困难已极,无法发足,积欠甚巨。浙大与其他各大学较,相形见绌,无从发展,员生睹此情形,纷请援中央大学例,以后经费完全由财部发给。放于本日来京接洽此事,浙大经费每月六万五千,现财部已担任三万五,再增加三万,于国库为数甚微,而于浙大关系至巨。宋部长刻正在汉,务恳钧座面嘱宋部长,对此事予以批准,则浙江高等教育幸甚。”^⑦ 蒋介石转与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核办。^⑧ 12月,教育部指令,浙大经费由财政部加拨1.5万元,其余仍由浙江省财政厅拨付。程天放又电呈蒋介石,请其面谕周骏彦,“浙大经费,中央未允前,仍应由浙江省负担”,复得蒋介石之同意。^⑨ 不过,直至程天放离任,其使浙大经费完全由国库负担的目标远未实现。

1932年,浙江省财政因支出过多,收支严重不敷。在制定1933年度概算时,教育厅厅长陈布雷倡议实行紧缩政策,并表示愿从教育厅及教育费开始实行。此议得以通过,各校经费均缩减至九折。^⑩ 1933年春,郭任远接任浙大校长后,对于经费问题的解决思路是:一方面向中央及浙江省请

① 《浙大工学院院长辞职后校长程天放自行兼代》,《申报》,1932年6月17日,第4张第13版。

② 《蒋中正电鲁涤平周骏彦务希按月照拨浙江大学经费》(1932年6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053-026。

③ 《国立专科以上校长会议以经费为中心》,《湖北教育厅公报》第3卷第9期,1932年7月31日。

④ 《浙大变更组织》,《申报》,1932年7月26日,第3张第10版。

⑤ 程天放:《浙大改组的意义及将来的希望》,《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02期,1932年9月10日。

⑥ 《浙大校长程天放临别勉励学生》,《申报》,1933年3月17日,第4张第13版。

⑦ 《程天放电蒋中正请援中央大学例由财政部发给浙大经费并嘱宋子文批准浙大经费》(1932年11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062-038。1932年行政院第12次会议议决,中央大学每月经费16万元,从2月起,暂由财政部全部拨发。

⑧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7),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330、331页。

⑨ 《程天放电蒋中正中央未允前仍由浙江省负担浙江大学经费》(1932年12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066-055。

⑩ 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第135页。

求援助；一方面尽力从内部节省，以余款扩充图书、仪器。^① 为此，他调整浙大行政机构，以缩减行政费用。是年夏，郭任远听闻浙江省因本年度财政不敷，下年度预算拟将浙大补助费全部停止的消息，即通过陈果夫请求蒋介石令浙江省政府转饬财政厅照拨经费。蒋介石回复说，日前中央所核定的浙江省预算，只批令浙大补助费移请中央发给，并非置之不顾。蒋介石还表示，浙大补助费应由中央承担。^② 郭任远上任后的另一项举措是兴建校舍。浙大各院校舍大多袭用清末民初之旧建筑，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陈旧残破，栋倾壁裂，有倾圮之虞。兴建校舍又涉及购置土地及向教育部申请增加临时费等问题。浙大将省立蚕桑学校及浙大农学院校地出让给中央航空学校，以补偿款在杭州太平门外购地500亩，建筑新校舍。1934年春，农学院校舍首先投入使用，其余各馆舍亦计划次第兴建，计划四年完成。在与中央航校会商收购校地事宜、农学院等搬迁与过渡、新购置土地纠纷等一系列过程中，郭任远、陈布雷等多次致电蒋介石，请其帮助浙大与中央航校、杭州市政府等方面进行协调，解决浙大方面的具体困难，蒋介石均予以了协助。^③

竺可桢接受浙大校长任命前，曾向陈布雷提出三点要求：“财政须源源接济；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对于经费问题，陈布雷的答复是，由国库承担的4.5万元按月发放是可靠的。^④ 就任前，竺可桢数次与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商洽经费问题，要求将国库负担浙大经费款额增加到每月6万元，终获王世杰应允。^⑤ 此外，为继续修建新校舍，竺可桢试图增加浙大临时费预算，但与教育部当局数度接洽，未获结果。

1936年10月，竺可桢在中央航空学校学生毕业典礼上，遇到蒋介石，感到“蒋颇关心浙大”，邀请其到浙大演讲。^⑥ 15日，蒋介石在陈布雷等陪同下，到浙大参观。竺可桢提及，浙大扩充校舍须将工学院旁军政部兵工署军械司所属浙江省军械局火药库之地纳入，蒋介石表示应允。竺可桢又提出，浙大临时费除非于一两年内大加扩充，否则校舍无从建筑。蒋介石表示本年已无办法，需俟下年度。随后，竺可桢等陪同蒋介石到教室、图书馆参观，并借机展示校舍之残破现状，蒋介石“即谓确非加新建筑不可”。^⑦

自此次视察，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蒋介石对于浙大校务多有过问，使竺可桢感到蒋介石关心浙大。蒋介石视察后不久，竺可桢作《半年来浙大之改进》，托陈布雷转交蒋介石。^⑧ 11月初，蒋介石电告竺可桢对于报告的意见。随后，竺可桢接到通知，行政院会议已决议将军械局土地拨归浙大使用。竺可桢为浙大的发展前景称幸，“蒋先生虽不在南京，而此事之得成功竟如此迅速，乃赖布雷、咏霓之帮忙不少。卅年以来火药库与大学毗邻，人心不遑宁处，今一旦解决为之大快，而浙大

① 《郭校长补行宣誓》，《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31期，1933年4月29日。

② 《陈果夫电蒋中正请令浙江省政府转饬财政厅照发浙江大学经费以整顿该校》（1933年8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117-124。

③ 《陈布雷电蒋中正与毛邦初郭任远洽迁移省立蚕校农场及浙江大学农学院场舍并请饬飞机场补助经费》（1933年8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113-079；《孔祥熙电蒋中正收购蚕桑学校校地请航空署于二十七万之外酌给建设厅经费补偿该校建筑费用》（1933年8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114-006；《陈布雷等电蒋中正飞机厂收用农院蚕校事若农园给价不敷迁移费则先划地一部供机厂用校址暂不迁》（1933年10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128-025；《蒋中正电周象贤希市府协助浙江大学农学院收用华家池头土地及周象贤回电北段地纠纷已解将来如征收南段地时当尽量协助》（1934年6月5日、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167-094。

④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35页。

⑤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47页。

⑥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161页。

⑦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163页。

⑧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170页。

百年大计亦于此决定,以现有二百亩之地基办一大学亦绰绰有余矣,何必再移城外华家池哉”。^①

1937年初,浙大拟订建筑计划,分两年进行,预计需临时费120万元,呈报教育部、行政院批准。3月5日,蒋介石召集行政院茶谈,讨论1938年度中央预算问题。15日,教育部拟定1938年度中央教育文化预算,较上年增500余万元,增加部分主要用于地方义务教育、民众教育,及扩充内地大学教育。此预算获蒋介石同意。^②

竺可桢由陈布雷处得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似认为浙大的临时费预算数额过大。竺、陈二人商定,此事须与蒋介石面谈。3月30日,竺可桢等在陈布雷陪同下,谒见蒋介石。蒋介石问到军械局土地情况。竺可桢告知,与何应钦原商定拨给其土地后即搬迁,但后来何应钦索价30万元。蒋介石表示,此事他可以解决。^③蒋介石看过浙大建筑计划呈文后表示,120万元分作两年支付则每年数额过多,可分作五六年支付。陈布雷随即受命发电报给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及财政部、教育部,“嘱拨建筑费”。^④然而,次日中午,暂代翁文灏行事的何廉告知竺可桢,教育部下年度预算早已送入国府,已开会四次,此日为最后一次审查。“故蒋电成马后炮。”午后,何廉又电话告知,教育部预算审查结果,浙大经常费增加2万元,临时费定为15万元。这与浙大的预算相距甚远,竺可桢于失望之余,又感到尚有一丝希望,“唯知蒋先生特别欲帮助浙大,则可于临时预备费想办法耳”。^⑤但是,浙大建筑计划暂时已无法完成,不数月,七七事变爆发,是年底,浙大被迫踏上西迁之路。

概言之,程天放及其后历任浙大校长为解决经费问题,通过私人管道,同蒋介石、其亲信浙籍幕僚及高官进行接洽,而蒋介石等出于“乡谊”,对于浙大的经费给予一定优待。这种情形在抗战时期依然延续。据陈训慈回忆,正是由于“乡谊”和对竺可桢治校的认可,尽管战时教育经费困难,但涉及浙大经费,陈布雷与陈立夫之签报追加,总能得到蒋介石的批准。^⑥

三、校长治校理念、校风与学潮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教育界普遍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学潮迭起。学潮的起因十分复杂,时人有将其归结为“学生以及教育者”,“在现阶段的紧迫空气中,忍受不了此种内外夹攻的苦痛,起而作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反抗,而要寻求民族国家的出路,以及个人的出路”。^⑦具体而言,此时期引发学潮的主要因素,包括教育经费拖欠、民族危机的刺激、国民党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学生对于校务的不满等。为加强对学生的控制、应对学潮,国民政府于1930年发布《整顿学风令》,1932年又发布《整顿教育令》。

就浙大而言,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该校以学生好学、学风素朴见称。1931年4月,蒋介石初次视察浙大,对校风颇表满意,表扬学生守规矩、勤苦用功,教职员精神好。他在浙大做了题为《求学先要立定志向》的演讲,引浙江历代名人为例,强调求学首先要立定志向,青年要自强不息,“行动态度德行都要好”,“要有秩序,能守规律”。他认为,中国已到了危亡之时,但倘若有好子弟,就

①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174、175页。

② 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37年3月15日,第12页。

③ 4月30日,竺可桢告诉朱家骅,军械局地已由浙大以5万元购得。参见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293页。

④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275页。

⑤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287页。

⑥ 陈训慈:《竺可桢出长浙大由来及其他》,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代宗师竺可桢》(《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⑦ 吴景贤:《一九三二年之中国学潮》,《学风》第1、2期合刊,1933年3月15日。

不会为帝国主义者所轻视欺侮,强调学生要接受严格教育,严以自律,“现在中国救国的方法,就是一个教育。而教育唯一的方针,就是一个‘严’字”。^① 时人评价浙大学风说,“浙大学风素以沉静纯良为社会所称道,学生尤勤朴好学”。^② 浙大学生亦认为,该校可贵之处在于“朴素可风”。^③ 此时期,浙大亦发生了数次学潮。除1931年因经费问题引发的部分学生冲撞教授及校长事件外,较大规模的学潮有三次,其中两次皆起自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浙大学生和教职员成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浙大学生还联合杭州其他大中学校学生,成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抗日救国后援会,于10月初在杭州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11月下旬,包括浙大学生在内的杭州大中学校学生集队赴南京请愿,提出国民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北上指挥抗日等要求。^④ 浙大工学院学生加入了与浙江省党部人员有关的杭州市各界反日救国联合会,在省党部人员的指导下检查日货,因工作认真,颇得党部好评,但在起获高义泰私藏日货后,因为此案处理虎头蛇尾,导致学生怀疑省党部腐化,对其失去信任。杭州各校学生筹划另组织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浙大工学院学生决定加入,而省党部对此类组织不予承认,教育厅亦通令取缔。12月10日,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浙大工学院学生参加,示威中,省党部、教育厅厅长张道藩之宅被学生捣毁。省党部归咎于浙大工学院,并怀疑院长李熙谋纵容学生。^⑤ 其时,浙大校长邵裴子已于一个月前向教育部请辞,各学院事务由院长处理。此次事件发生后,工学院院长李熙谋、农学院院长许璇、文理学院院长邵裴子一同请辞,教育部答复均毋庸议。^⑥ 直到次年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终于决议邵裴子准予辞浙大校长职。

郭任远执掌浙大期间,发生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学潮。两次学潮起因有所不同,但后来都发展为反对校长的风潮。二者之间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和共同的深层原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步确立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在大学施行训育。浙大先后设立训育处、学生生活指导员等作为实施训育的机构。训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军事训练。九一八事变后,外患日重,对学生的军事训练也在逐步强化,有研究者认为,此时期,军训在校园的实施,“也由普通军训发展到集中军训,再到学校军事化管理”。^⑦ 程天放任浙大校长时,设立军事训练部,直接隶属校长。郭任远接掌浙大后,持严格训练的办学原则。他认为,国民习惯散漫,而民族危机日重,担任教育者“亟须注意于组织纪律”,“余以上述之见地,办理浙大,故亦主张严格管理,严格训练”。^⑧ 他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制定严格的注册、请假制度;强化学生的军事训练,采纳军事教官提议,依照国民政府1929年公布的《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奖惩规则》,切实执行,以作为考察学生军训成绩及奖惩的办法。对于学生违反纪律的情况,郭任远及训育人员实行严厉的处罚,每届寒暑假,动辄开除大批学生。

1934年底,浙大“偶因细故”,发生风潮。^⑨ 10月25日,两名四年级学生与一名教师因网球场地问题发生言语冲突,体育委员许某等两教师以辞职迫使校长严办,两学生随即被公告开除学籍。浙大学生同情被开除者,认为处分过重,“亦不能不感学籍之毫无保障”,于是在29日召开全体大

①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0),第433—444页。

② 《浙大学潮平议》,《东南日报》,1934年11月2日,第1张第2版。

③ 来度:《浙大投考经过及近讯》,《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校刊》第168期,1937年6月10日。

④ 施平(施尔宜):《“九一八”赴京请愿》,参见黄继武、张哲民编《求是精神与浙江大学“一二九”运动: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老校友回忆文章及有关史料集》,1997年印,第140—147页。

⑤ 《浙大工学院教授为杭市学生示威运动敬告各界书》,《申报》,1931年12月17日,第3张第10版。

⑥ 《邵裴子不长浙大》,《申报》,1931年12月29日,第2张第8版。

⑦ 张均兵:《国民政府大学训育(1927—1949)》,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⑧ 《浙大风潮已渐趋缓和》,《东南日报》,1934年11月2日,第2张第6版。

⑨ 《浙大风潮已渐趋缓和》,《东南日报》,1934年11月2日,第2张第6版。

会，并于次日集队前往校长公舍请愿。^① 郭任远被迫写下收回成命的字条，随即向教育部请辞。学生自治会决议不罢课，但学生举行了欢送校长大会，并有驱逐数名教职员之举。^② 11月5日，郭任远在教育部的一再慰留、敦促下，回校视事。此次风潮，虽表面上看系“偶因细故”而起，但实质与郭任远严格高压的管理方式有关。风潮发生后，郭任远仍坚持其治校方针，在回校前夕，他致电教育部，请求对于严格训练之办学原则的指示，教育部复电对此办学原则表示赞同。^③ 蒋介石亦致函郭任远，责令其整顿学风。^④ 1935年，为进一步整饬学校风纪，浙大开始实行军事管理。但郭任远所任用的军事教官“皆低薪阶级，资格甚差，不足引起学生之敬仰心，学生衔之切骨，寻常高压之下，敢怒不敢言，一旦爆发，乃不复可抑制”。^⑤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示威游行，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浙大学生起而响应。10日，浙大三学院学生400余人开会，议决通电响应北平学生示威；通电全国各校一致响应；联络杭州各校学生，组织宣传团，向民众宣传反对华北自治等项。会上还成立了浙大学生自治会，施尔宜、杨国华当选正副主席。11日，浙大学生联合杭州市各大中学校学生万余人，举行游行，反对华北一切假借民意之自治组织。“一二·一六”事件消息传到杭州，20日晚，浙大学生召集全体大会，决议于次日晨全体赴京请愿。是夜，便衣侦探、武装军警包围学校，逮捕学生代表10余人。学生情绪激愤，设法与军警周旋，全体出校，列队抵达城站。铁路方面已奉令停驶，学生占据城站等待，与军警对峙。数名浙江省党部委员及省政府秘书长黄华表前往劝阻，郑晓沧等浙大教师亦赶至。学生在雨中坚持10小时，提出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同学，开放新闻封锁，军警道歉，保障爱国运动，撤回军警。黄华表一一作答。被捕学生被送至城站后，学生列队返校。^⑥

回校后，学生对赴京请愿受阻进行检讨，有人注意到军警便衣逮捕学生过程中有训育处职员和军事教官带路，从而对校长产生怀疑，认为，“此次爱国运动，郭氏于历次会议均深表赞许”，“谎言犹在耳，而阴已行其借刀杀人之计矣！”自此，学生运动的指向转为反对校长。1935年12月23日，以全体学生名义，发布《驱郭宣言》，指摘郭任远在校务、经济、私德各方面的“诸多劣绩”，在校务方面，指责其“独断”“植党营私”，“任意退斥学生”等。^⑦ 郭任远再次提出辞职。学生组织纠察队，控制校内交通、电话，检查公文邮电，驱逐军事教官及训导员。24日至28日，浙大学生代表分头至浙江省政府、教育部、行政院请愿，请求准予郭任远辞职，并早日决定校长人选。教育部准郭任远暂时休假，命浙大组织校务会以维持校务。28日，浙大校务会成立，郑晓沧任主席，议决恢复常态办法三项：学生不得干涉学校行政；学生取消纠察队；农学院学生回农学院上课。^⑧ 学生自治会表示接受，31日，农学院学生回院上课，纠察队取消，但学生拒郭态度依然坚决。^⑨

为应对“一二·九”以来各地学生源源不断地进京请愿，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令教育部召集交通

^① 《浙大风潮已渐趋缓和》，《东南日报》，1934年11月2日，第2张第6版。

^② 阿金：《浙大纠纷记》，《十日谈》第44期，1934年11月20日。

^③ 《浙大严格教育原则业经教育部核准备案》，《东南日报》，1934年11月8日，第2张第6版。

^④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8)，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488页。

^⑤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63页。

^⑥ 《浙大学生昨拟晋京请愿经党政当局劝回》，《申报》，1935年12月22日，第1张第3版；《浙大学生集合请愿经过》，《申报》，1935年12月24日，第2张第7版。

^⑦ 《1935年12月23日浙大暨高工高农全体学生〈驱郭(任远)宣言〉》，黄继武、张哲民编：《求是精神与浙江大学“一二九”运动》，第127—128页。

^⑧ 《前校务会陈报经过》，《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40期，1936年3月7日。

^⑨ 《浙大风潮告一段落》，《申报》，1936年1月1日，第7张第28版。

较便各省及直辖市专科以上重要学校,推选学生代表,随同校长于1936年1月15日在南京会谈。^①浙大由郑晓沧率领学生自治会所推学生代表陈迟、江希明、曹寅亮前往。15日,蒋介石、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在南京接见各省市校长及学生代表300余人,听取校长及学生对于内政、外交、教育的意见。16日,蒋介石在励志社向校长及学生代表作了题为《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的演讲,讲说国际形势、外交方针,阐发关于教育及学生的看法和主张。^②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也对教育界所关心的各项教育问题做了说明。陈迟回杭州后,向其父陈布雷叙述此次参加会谈的经过,表示各地学生“对于蒋院长之演词,均认为诚恳周详;对政府之决心,加一番认识,结果甚佳”。^③

1936年1月,蒋介石采取措施,处置浙大学潮。1月初,蒋介石收到戴笠关于浙大学潮的情报,涉及1月1日该校学生自治会的决议,包括“教部未准郭任远辞职以前,同学不离校,不上课,亦不大考”等。^④他随即致电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询问情况,黄绍竑回复,并称浙大“现尚未恢复常态,权操学生会”。^⑤18日,蒋介石抵达杭州,随后,与陈布雷等多次讨论浙大学潮问题。陈布雷自1935年底一直在杭州养病,对于浙大学潮十分留意,常与郑晓沧及其他关心此事人士讨论,并从在浙大读书的儿子那里了解相关情况。19日,蒋介石将“浙大案”列为近期应注意事项之一。^⑥20日,他与陈布雷谈浙大事,陈布雷受命发两电与教育部,并通知浙大校务会蒋介石将到校视察。^⑦21日,蒋介石在陈布雷、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等的陪同下前往浙大,与教职员谈话,并召集全体学生训话,责成教职员、学生共同维持纪律。他还召见了学生代表施尔宜、杨国华、江希明。蒋介石提出处理意见:开除施尔宜、杨国华,但如其能悔过,可告教育部恢复学籍,予以自新之路。陈布雷、许绍棣随后与浙大校务会讨论善后事项。同日,教育部电令:开除施尔宜、杨国华,其余从宽免究;寒假期间学生必须一律离校。^⑧22日,蒋介石再次召见施尔宜、杨国华、江希明、陈迟,其态度较前日缓和不少。^⑨浙大学潮在蒋介石的直接干预下平息。寒假结束后,施尔宜、杨国华二人恢复学籍。不久,竺可桢被确定为下任浙大校长人选。综观此次驱郭风潮,在其解决过程中,陈布雷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当局也听取了郑晓沧等浙大教授以及学生代表等方面的意见。施尔宜(后更名施平)后来回忆说,蒋介石亲赴浙大,了解情况,与学生谈话,听取教授方面的意见,所以此次处理浙大问题“是比较稳妥的”,没有一个学生被捕或被开除,而且采纳了师生的意见,撤换了郭任远,派来了一个好校长,问题得到了解决。^⑩

竺可桢自接掌浙大后至七七事变爆发前,数次见到蒋介石,后者每次皆对浙大近况,特别是校

① 《蒋院长定期会见各省市学界代表》,《申报》,1935年12月24日,第1张第3版。

② 蔡盛琦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5),台北,“国史馆”2009年版,第120—337页。

③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民国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1936年1月19日,第99页。

④ 《戴笠呈蒋中正报告广州学潮及浙大学潮等》(1936年1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467-075。

⑤ 《黄绍竑电蒋中正浙大学生确有寒假不离校不大考决议及确有逮捕施尔宜等向省府请愿以黄华表为校长者》(1936年1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467-079。

⑥ 蔡盛琦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5),第346页。

⑦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民国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1936年1月20日,第99页。

⑧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民国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1936年1月21日,第99—100页;《校务会议纪录汇志》,《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36期,1936年2月8日。

⑨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民国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1936年1月22日,第100页;施平:《“一二·九”抗日救亡狂飙在国立浙江大学》,黄继武、张哲民编:《求是精神与浙江大学“一二九”运动》,第15—23页。施平认为,蒋介石在风潮发生后亲自到浙大了解情况,是导致其态度变化,以及影响其对学潮处理办法的重要因素。

⑩ 施平:《“一二·九”抗日救亡狂飙在国立浙江大学》,黄继武、张哲民编:《求是精神与浙江大学“一二九”运动》,第22—23页。

内秩序表示关心，并于 1936 年 10 月 15 日到浙大参观。而就教育理念、治校方针而言，竺可桢与前任郭任远及政府当局之间均有较大差异，尤其对在大学推行军事管理颇不以为然。“余以为大学军队化之办法在现时世界形势之下确合乎潮流，但其失在于流入军国主义，事事唯以实用为依归，不特与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不合，即与英美各国大学精神在于重个人自由，亦完全不同。目前办学之难即在此点。郭之办学完全为物质主义，与余内心颇相冲突也”。^① 接任校长前，竺可桢曾特意向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征询办学方针，“关于办学方针是否采英美之 Academic Freedom 学术自由或法西[斯]蒂独断行为，渠亦未能有明白之表示也”。^② 不过，在其担任校长之初，这种教育理念的分歧尚未影响到浙大与当局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发展高等教育方面的一项举措是在各地陆续新设了一批国立大学，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全国已有国立大学 13 所。从理论上讲，国立大学直属教育部，校长由中央任命，经费由国库负担，而在最初数年，各项制度政策尚未完备，或者未切实执行，特别是教育经费问题。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内争未宁，民族危机日亟，高等教育经费无法保障，各国立大学普遍面临经费积欠，校长辞职，学潮的困境。陈能治从制度层面分析了造成此时期国立大学教育经费问题的原因，将其归结于国家财政体系未能健全，预算制度不合理。他还提出，对于经费由地方在国税项下直接拨付的国立大学，特别是在江苏、浙江这类中央征税之主要省份，中央地方税源划分影响到中央大学和浙大的经费问题。^③ 对于抗战前中央大学的经费问题，蒋宝麟做了考察。他认为，南京政府成立后，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进行重新划分，影响到该校经费来源，各方围绕该校经费问题展开博弈，直到 1932 年，该校经费完全由中央财政承担，完成教育经费层面上的“再国立化”。^④ 与中央大学相似，浙大亦遭遇严重的经费积欠，并引发学潮及校长辞职，不过学潮与校长问题未如前者那样严重。单就这两所国立大学而言，其经费问题之产生，有共通的深层因素，如中央及地方财政困难，中央财政制度的缺陷等，但引发问题的具体缘由，问题的爆发时间、其表现及解决的步骤，又有所差异。就浙大而言，改为国立大学的最初几年，其经费事实上由浙江省负担。此时期，因浙江省财政困难，浙大经费受到拖欠，但学府与省府、国立大学与地方之间并未因经费问题发生严重分歧。直到 1932 年初，国民政府改革税制，实行裁厘后，浙江省政府不愿再负担国立大学的经费。程天放之后的历任校长解决此问题的基本方向，是力图循中央大学之先例，使浙大经费逐步转为全部由更为可靠的国库承担，以实现“国立”大学应有之意。^⑤ 为此，他们通过私人管道，同陈布雷、蒋介石、翁文灏等接洽，以增加中央拨款数额，增加该校临时费，并通过中央敦促浙江省按期拨款。蒋介石等出于“乡谊”，在经费问题上对该校予以帮助，并在其购地、兴建校舍等问题上，代之与有关军政部门进行协调。但是，仰仗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干预毕竟只是临时之举，经费问题的真正解决仍有赖于南京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总体状况的改善以及相关政策的调整。1932 年，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后，浙大经费困境有了显著缓解，至少暂时不再成为一个威胁到校

①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 6 卷，第 36 页。

②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 6 卷，第 39 页。

③ 陈能治：《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第 209—222 页。

④ 蒋宝麟：《财政格局与大学“再国立化”——以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为例》，《历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

⑤ 自 1931 年春，浙大经费中由中央财政负担的金额及其所占比重在逐步增加，但直至抗战全面爆发，该校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经费的意愿并未实现。

务进行或影响师生日常生计的问题。^① 浙大为解决经费问题而与蒋介石等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但这一特殊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双刃剑,使该校更易于受中央政权及国民党之干预。

任以都在讨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时,提出,“高等教育是中央政府扩充权力的渠道之一”。^② 引申而言,此时期的国立大学,亦为国家权力、党权所不断渗透。抗战前,国民党强化对国立大学的控制的途径之一,是以“忠实同志”担任校长。国立大学人选问题上所体现出的教育的官僚化,以及党派借以扩张势力的倾向,引发知识界的批评和学生的抗议。浙大虽未因校长人选问题发生学潮,但也险象环生。国立大学校长依程序由教育部部长提出于行政院会议议决。就1930年至1937年间的浙大而言,邵裴子作为长期实际处理校务的副校长,被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推荐为校长;其后的历任校长,在其人选的决策过程中,蒋介石、陈立夫、陈布雷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此时期,以“二陈”为代表的党的势力试图借由掌握浙大校长这一职位以控制该校,但此举也受到来自学生及知识界的一定的抵制。教育行政官员出身、CC系的程天放担任浙大校长后,党部的力量开始进入浙大。程天放被蒋介石调往湖北后,陈立夫提名CC系的余井塘继任。因浙大学生之反对余井塘,陈立夫又提名郭任远。郭氏虽出身书斋,但他任职后与“二陈”多有往还,使后者更深入地介入浙大校务。当郭任远因浙大学生之反对而辞职时,竺可桢指出,“郭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③ 经郑晓沧推荐,陈布雷向蒋介石提议以竺可桢为新任浙大校长人选。竺可桢接受校长职的动机之一,即是不愿使浙大陷入党部之手。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由于教育经费的拖欠,民族危机的刺激,国民政府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学生对于校务的不满等,各国立大学学潮迭起。浙大规模较大的两次学潮皆发生在郭任远任内,一次起自偶然事件,一次起自抗日救亡运动,两次学潮后来均将矛头指向校长,归根结底,是对郭任远严格管理、严格训练的办学原则和高压治校方式的反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国民政府强化对高等教育控制的反弹。第二次驱郭风潮在蒋介石的亲自干预下平息,接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检讨前任的治校方针,确立了学术自由的教育理念。

同时,抗战前的浙大尽管遭遇了经费、学潮、校长频繁更迭等种种困难,但校务渐次发展。本文因篇幅所限,对于该校行政机构、院系设置、规章制度、招生、延揽教师、图书仪器等的各项细节问题,未及展开,但仅从解决经费,兴修校舍这些基本问题来看,也可窥见历任校长整顿校务之努力,正是这些努力,为战时浙大在竺可桢主持下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作者张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据陈能治的研究,1933年后,高等院校经费问题缓解,前此由经费问题所带来的余波基本解决。参见陈能治《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第292—294页。

^② 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2页。

^③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29页。